

喻 琴 著

艺术“文本”的社会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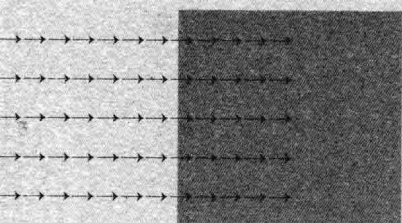
——“文本社会学”的理论阐释及批评实践

YISHU **WENBEN** DE SHEHUIXUE YANJIU

Wenben Shehuixue
de Lilun Chanshi ji Piping Shijian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南昌大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批准号：12XCZ26）



艺术“文本”的社会学研究

——“文本社会学”的理论阐释及批评实践

喻 琴◎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文本”的社会学研究：“文本社会学”的理论阐释及批评实践 / 喻琴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210-05714-7

I. ①艺… II. ①喻… III. ①艺术社会学—研究

IV. ①J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9022 号

艺术“文本”的社会学研究——“文本社会学”的理论阐释及批评实践

喻 琴 著

责任编辑：周伟平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054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250 千

ISBN 978-7-210-05714-7

赣版权登字—01—2013—18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26.00 元

承印厂：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社会,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它既包含了社会的物质基础,也包括了社会的上层建筑。而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既包括了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的社会设施、社会体制,也包括了精神层面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形态等不同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以对人类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的透彻分析为逻辑起点和理论支点的。

不奇怪,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早在进入私有制和国家阶段之前,过得就是一种群居的社会化生活。所以,“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页)。如果说人类社会“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那么,人类社会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便是“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换言之,人类社会“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正是基于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科学认识,他们才对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宗教进行了批判:“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正是因为人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存在,人的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人类一切现象都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从人和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研究人类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其中包括文学艺术活动,自然也就成为文艺研究的一种普遍而有效的途径与方式。从孔子、柏拉图以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以文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来进行文艺研究,其中包括文艺的社会本质、社会过程、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等不同方面,也就是所谓的文艺社会学。这里的“文艺”自然是广义的文艺,它不但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所以,文艺社会学往往也称之为文学社会学、艺术社会学等。

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主要是一种文艺社会学理论。从创作论中的“发愤著书”“不平则鸣”说,到价值论中“兴观群怨”“诗教乐教”说,到批评论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以及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畏权豪怒,亦任亲朋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甚至“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等,无不着眼于文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展开。

西方自柏拉图奠定了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意义”论、“价值”论社会学传统后,经过18世纪意大利启蒙主义理论家维柯对于历史主义方法的自觉倡导(《新科学》1725)、德国文艺理论家赫尔德对历史主义方法的成功实践(《鄂西安和古代民族歌谣》1773)、法国浪漫派先驱性人物史达尔夫人《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看文

学》(1800),已明确将“考察宗教、风俗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反过来,也考察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与宗旨。而她的《论德意志》(1810)更是进一步对德国文学的社会民族特性作了详尽的考察。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在孔德的实证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论(《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成为19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研究的代表性理论成果。与他同时代的法国学者居约《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1889),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尽管20世纪初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出现了所谓“形式论”或“语言论”转向,但即便在“形式主义”或“文本中心主义”甚嚣尘上尽领风骚之际,由于文艺社会学毕竟有着自身与生俱来的理论优势和学术价值,因而它仍然是一股历久而弥新的批评理论与批评力量。正如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朗松所言:“文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法国文学是法兰西民族生活的一个方面;它把思想和感情丰富多彩的漫长的发展过程全部记载下来——这个过程或者延伸到社会政治事件之中,或者沉淀于社会典章制度之内;此外,它还把未能在行为世界中实现的苦痛或梦想的秘密的内心生活全都记录下来。”(昂利·拜尔编,徐继曾译《方法、批评及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正基于“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个社会现象。这是个人的行为,但这是个人的社会行为”;“文学现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实”,所以他如此强调:“文学史中最重要的那些问题是社会学问题,我们大部分工作都或者以社会学为基础,或者得出社会学的结论。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解释作品;不把个人的行为化为社会行为,不把作品和人放在社会的序列中,我们怎能把作品解释清楚?”(昂利·拜尔编,徐继曾译《方法、批评及文字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4-48 页)而西方文艺理论 1970 年代后发生的“文化论”或“人类学”转向,更是导致了各种泛政治化、泛文化化的批评理论大畅其道。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有着综合创新性质的文学社会学、文艺社会学、艺术社会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以其对传统价值立场的坚守和对现代批评方法的借鉴,给人以深刻感悟与启示。

奥地利学者皮埃尔·V. 齐马在 1980 年代所创立的“文本社会学”理论,便堪称代表了 20 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研究理论创新的突出成果。喻琴博士的《艺术“文本”的社会学研究——“文本社会学”的理论阐释及批评实践》,正是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扎实的理论功底,紧紧抓住这一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了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艺社会学创新成果的学术内涵、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彰显了它的学术创新点和创新方式,并在此基础作了具有探索性的理论阐发,揭示了它在当代多元对话语境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总体来看,我以为喻琴博士的这一研究成果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与亮点:

第一,对齐马“文本社会学”理论方法进行了系统而精细的理论概括与分析。

作者认为,齐马的“文本社会学”之精义或者说它的独特创新之处,即表现为它坚持了传统文艺社会学的价值立场,又充分汲取和借鉴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语言论”或“形式论”转向的理论成果,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文本出发,紧紧抓住“语言”这一中介,通过“文本细读”和“话语分析”方法,揭示出“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如何在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得到表现的”。因此,在方法上,它实际上将结构主义关注的文本结构与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的

深层意蕴结合起来、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统一起来、将自下而上的“实证”的方法和自上而下的“批判”的方法综合起来,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对此,作者以“整合了社会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与精神分析批评”、打通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融合了“实证”方法与“批判”方法为标题,从三个角度三个层面所进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是高屋建瓴很有创见的,有很强的理论统摄力与穿透力。

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作者对其中理论关节点的把握和剖析,也是精细而准确到位的。

比如,文本社会学所关心的是“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如何在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得到表现的”。它要求“回答文学作品怎样在语言层次上对社会和历史问题作出反应的问题”。据此,作者强调:文本社会学的理论关节点,就是通过语言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从而在语言这一最基本最坚实的层面实现文本的社会意识形态转换。正如齐马所指出:“社会价值几乎从不独立于语言而存在,词汇、语义和句法的单位表达了一些集体利益,并且能够成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赌注。”正因为社会问题与集团利益、阶级利益等意识形态范畴的问题,可以在语义、词汇和话语层上推论出来,因此,在文本社会学中,“文本内”与“文本外”实际上已经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语义层:是通过语义的分类行为来表达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词汇层:词汇单位总是会带上利益与社会冲突的烙印——“一切阶级斗争往往可以概括为拥护一个词、反对一个词的斗争”;话语层:根据语义分类建立参与者模式,以此推论出叙述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而言之,文本社会学的独创性,主要即表现为在文本结构(语义、词汇、话语)与社会

结构的互动过程中,推断出文本所蕴藏的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从而揭示出作品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

又如,“文本社会学”致力于“语言”向“意识形态”转换的推论过程,这个推论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在操作上它有哪些关键性的技术措施与细节?对此,作者指出:要确定文学文本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把社会领域看成是由各种集体语言组成的整体,即一个特定的社会语言环境。而这些集体语言则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虚构作品的语义和叙述结构之中”。“社会”经由“语言”这个中介,被推论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语言环境”或“社会语言结构”,而“文本结构”(词汇/语义层、句法/叙述层),通过经“集体语言”——“社会语言结构”模式,替代了原来习用的“文学—社会”模式。其中的“集体语言”,成为沟通文本结构与社会语言结构之间的通道或桥梁。为此,作者特别强调了齐马文本社会学的“集体语言”概念,指出:在齐马的理论中,“集体语言”是用一个专门术语——“社会方言”——来表述的。所谓“社会方言”,指的是一套代码化的词汇。因此,在分析作品之时,首先要找出文本中的“社会方言”。在文本中,社会方言以“话语”形式出现。而对于话语的分析,首先又必须找到“说话人”或“叙述主体”,即,要找到建立在语义基础上的“参动者模式”。只要厘定了文本中的参动者模式,就可以推论出叙述行为主体的语义选择。也就是说,就理论的运思模式而言,从“文本结构”到“社会语言结构”,从“社会方言”到“话语”形式,从“叙述结构”到“参动者模式”,从“语义选择”到“集团利益”或价值体系,通过这么一系列的推论和转换过程,文本所潜舍的社会意识形态性或历史文化底蕴才得以显山露水。诸如上述种种分析与见解,是精细入微切中肯綮的,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对齐马“文本社会学”理论方法进行了具有检验性示范性的实验操作。

关于文本社会学的技术路线,作者在强调了它基本的运思模式 and 操作方法——致力于语义、词汇、话语三个层次的解析与推导。语义层:通过语义的分类行为来表达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词汇层:词汇单位总是会带上利益与社会冲突的烙印。话语层:根据语义分类建立参动者模式,以此推论出叙述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性——之后,为了更深入具体地说明这一技术路线,并检验这一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及其效度与信度,作者特别通过陈忠实的《白鹿原》和阿来的《尘埃落定》这两部先后荣获第四、五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进行了具有检验性示范性的实际操作:

在小说《白鹿原》中,“乡约”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方言”,是一套在当地民间始终占统治地位并具有威慑力的民间意识形态话语,反映的是民间的公共利益与价值体系。“仁义”是这套社会方言的核心词汇,和它相对立的是“邪恶”。根据异质同构原理,“仁义”可以推出善良、勤恳、忠厚、慎独、以德报怨等词汇,而“邪恶”则可推出罪恶、懒惰、卑鄙、淫乱、落井下石等一系列词汇。以词汇的语义对立来建构小说叙述话语的参动者模式:即主体——人,客体——白鹿原,施动者——乡约,受动者——原上的所有百姓,反对者——鹿子霖、田小娥、白孝文、黑娃、白灵等人,辅助者——朱先生、白嘉轩、鹿三等人。施动者(乡约)是受动者(原上的所有百姓)思想与行为的准则。为了保持主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人与白鹿原的平安祥和,人人都得依乡约行事。辅助者是乡约忠实的实践者、维护者和监督者,反对者则由于违反了乡约受到了肉体与精神

的苦难。然而在反对者中,也有对乡约的回归者,他们最终获得了新生。总体来看,叙述主体对乡约的有效性是持肯定态度的,由此显现了民间话语强大的意识形态性功能。

如果说作者对《白鹿原》的实验性分析,展示了民间话语(集体语言)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那么对于《尘埃落定》的实验性分析,则体现了民间话语(集体语言)对传统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怀疑或否定。而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是建构还是解构,都有力彰显了这种建立在话语分析基础上的文本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建设性力量。因此,当作者得出这一结论:“陈忠实、阿来以他们的作品来探讨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同的是,前者偏重于对传统话语意识形态功能的肯定,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重建权威话语或价值体系;而后者则偏重于对传统话语意识形态功能的质疑,并着力于将这一功能的内在差异性、悖谬性揭示出来。不过,对于‘社会方言’及其社会意识形态功能的关注与思考,却是共同的。也正是在这里,具有视界融合特点的齐马的文本社会学,显示了它独特的理论阐释力和学术生命力。”由于这一观点建立在批评实践的基础之上,因此不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 also 让人耳目一新,得到深刻的感悟与启发。

第三,对齐马“文本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当代意义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积极探索。

在上述理论阐释和实验分析之后,作者的研究与探索没有止步,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齐马文本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当代意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因此,全书在上篇“理论阐释”之后,又撰写了下篇“文本社会学的批评实践”,从而不但将“文本社

会学”的批评对象由小说文本推广到话剧、歌舞剧、电影、电视等不同艺术文本甚至社会文本,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建构“艺术文本社会学”的学术目标与理论策略,从而丰富与拓展了“文本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作者提出:“扩展‘文本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将文学文本向艺术文本延伸,把文本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小说、音乐、舞蹈、电影、电视等具体的艺术文本分析中,以此检验此理论的实践性,反思并完善文本社会学,为构建艺术文本社会学作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与尝试。”这一探索无疑是积极的,有价值的。作者认为“‘文本社会学’不但可以成为重建文艺社会学的一种有效途径,而且可以成为文学理论当代建构的一种理论策略,成为21世纪中国文艺学学科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一种思路和方法”,同样也是很有见地和建设性意义的。

喻琴是我2003级的研究生,当年她的硕士学位论文《齐马的文本社会学研究》,曾赢得了省外三位盲审专家不约而同的一致肯定与高度赞赏。三位专家的评语分别是:

论文将理论恰当地置于理论史背景中,通过细致地梳理、辨析,指明齐马理论的特殊含义和理论贡献,概括相当精确中肯。文章又以具体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为对象,以齐马理论为工具,通过具体的文本解析来检验、证明齐马理论的可操作性及其效度和信度。作者有较出色的理论功底,严谨、细致而又敏感。观点鲜明,立论妥帖扎实,显示出相当出色的理论品质和能力。

该论文的选题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关涉当代文艺学学科的前沿问题,具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开创性。论文对齐马的文

本社会学作出简洁的理论梳理,从宏观与微观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并通过这一理论与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和文艺社会学的对比,突显出其理论的魅力与个性,及其对当代文艺学科的重要意义。该文运用文本社会学理论所做的《白鹿原》、《尘埃落定》两部小说的个案研究、比较视野中的文本社会学、以及结论部分所述观点多有新意,能给人以启迪。该文比较充分显示出作者的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科研能力,以及较高的文字表达能力。

本文作者特别注意到齐马以语言为中介来深入细致地考察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重点展开研究,切中肯綮,也符合现实。本文选题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对中国文艺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本文在研究中,能将西方文艺理论用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分析,足见其魄力和功底。本文在大量研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完全显示了作者在本专业具有十分出色的扎实基础和科研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专家都分别打出了90多的高分。这种情况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应该是不可多见的。

2006年,喻琴以优异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她不但没有放弃文艺社会学研究,而且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了艺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领域。这本专著,亦可视为这一学术道路和研究转向的阶段性的成果吧。因此,当她将书稿清样发给我并向我索序时,尽管我面有难色,但也是没有推辞的理由的。

喻琴博士目前任教于南昌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本科生、研究生

的教学任务,势必为她的拓展性研究提供生生不息的内源性动力。
相信她,一定会不断推出新的更加优秀的研究成果。

是为序。

周平远

2012年11月于南昌

文本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常用的术语之一。新时期以来,它凭其丰富的内涵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①。学界一方面介绍西方形态各异的文本思想,另一方面也努力将西方的文本思想运用到文学、教育、翻译、艺术等各领域的研究实践中,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当然,有些学者并不满足仅仅单方面地从西方引入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文本理论,而努力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挖掘中国的文本思想,将二者加以对照,取长补短,从而为建构与发展文本学或文本批评学这一新的学科奠定基础。总的来看,中国的“文本理论”研究呈现了“文本”内涵丰富,但指涉模糊;个案研究重在突出独特性,比较研究相对薄弱;中西文本思想比较研究的视角独特新颖,但深

① 2012年1月10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80年至2012年检索结果:以“文本”为篇名有6250条;以“文本”为关键词则有19585条。

度不够的总体特点。

一

20 世纪以来,西方文论逐渐由作家作品转向文本研究,产生许多形形色色的文本理论流派。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们采取个案分析和整体梳理的方式介绍西方文本理论,其中对“互文性”理论的关注与研究特别引人注目。

第一,20 世纪一些重要理论家的文本思想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像罗兰·巴特、伽达默尔、伊瑟尔、德里达等成为个案研究对象,以突出他们各自文本理论的独特性。

罗兰·巴特作为西方文本理论的建构者,其文本理论独树一帜。陈平、张祎星等学者从“作者之死”、漂游、解构《萨拉辛》、阅读、叙事、文体和快感这几个方面探讨了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①将巴特的文本理论概括为:区别文本和作品,否定作者的权威地位,读者参与到文本的“编织”过程,以此肯定文本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系统。^②肖庆、龚举善等学者详细介绍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文本观。^③着眼于伽达默尔文本观的主要贡献及当代意义。^④史忠义的《“文本即生产力”:克里斯特瓦文本思想初探》^⑤一文将克

① 陈平. 罗兰·巴特的絮语——罗兰·巴特文本思想评述[J]. 国外文学, 2001(1).

② 张祎星. 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

③ 肖庆. 伽达默尔的文本观[J]. 晋阳学刊, 2005(3).

④ 龚举善. 理解的文本与阐释的方向——伽达默尔文本观的当代意义[J]. 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1).

⑤ 史忠义. “文本即生产力”: 克里斯特瓦文本思想初探[J]. 外国文学研究, 1999(4).

里斯特瓦的文本思想概括为“文本即生产力”。赵建红《论爱德华·赛义德的文本观》^①认为赛义德的“现世性”文本观强调文本的功能和文本在世界的定位状况,这是对经典的现实主义文本观和结构主义文本观的商讨。朱刚《从文本到文学作品——评伊瑟尔的现象学文本观》^②评述了伊瑟尔的现象学文本观。董希文在《超越文本:詹姆逊的泛文本理论与批评》^③一文中就詹姆逊泛文本理论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内涵与特征及意义与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康澄的《文本——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④一文旨在对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的核心概念——文本进行全面的考察,力求客观地阐释洛特曼文本理论的内涵、实质及其发展变化,并试图以此揭示出洛特曼文本理论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如果说以上论文力求全面地评介各位理论家的文本理论,以突出他们理论独特之处,试图整体把握各位重要理论家文本理论的核心思想,那么李旭《伊瑟尔与德里达文本观之哲学溯源》^⑤一文则是通过对伊瑟尔和德里达的文本观进行哲学溯源,比较二者文本思想的不同,揭示它们各自的偏颇与局限。

第二,以“文本”来串联 20 世纪西方各大文学流派,以此对西方文本理论作整体研究也是目前学界的研究重点。学者们从各自的理论基点出发,对西方的各大文本理论作了不同的分类与界定,以此为基点来概括文本理论的基本内涵。与此同时,他们也对西

① 赵建红. 论爱德华·赛义德的文本观[J]. 浙江社会科学, 2007(6).

② 朱刚. 从文本到文学作品——评伊瑟尔的现象学文本观[J]. 国外文学, 1999(2).

③ 董希文. 超越文本:詹姆逊的泛文本理论与批评[J]. 学术论坛, 2005(8).

④ 康澄. 文本——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J]. 当代外国文学, 2005(4).

⑤ 李旭. 伊瑟尔与德里达文本观之哲学溯源[J]. 理论学刊, 2006(7).